

觉醒
赖永海 主编

『性空』至『妙有』

魏晋般若学的流变与转向

● 府建明 著



觉群佛学博士文库



宗教文化出版社



觉群佛学博士文库

『性空』至『妙有』

魏晋般若学的流变与转向

● 府建明 著



宗教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性空”至“妙有”:魏晋般若学的流变与转向/府建明著. - 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1.12

ISBN 978 - 7 - 80254 - 486 - 4

I. ①性… II. ①府… III. ①佛教哲学 - 研究 - 中国 - 魏晋南北朝时代

IV. ①B94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75112 号

“性空”至“妙有”

魏晋般若学的流变与转向

府建明 著

出版发行: 宗教文化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后海北沿 44 号 (100009)

电 话: 64095215(发行部) 64095265(编辑部)

责任编辑: 王志宏

版式设计: 范晓博

印 刷: 北京柯蓝博泰印务有限公司

版权专有 不得翻印

版本记录: 640 × 960 毫米 16 开本 18.75 印张 250 千字

2012 年 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80254 - 486 - 4

定 价: 48.00 元

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
觉群佛教文化艺术基金资助项目

《觉群佛学博士文库》编委名单

顾问:	方立天	黄心川	杨曾文	楼宇烈	高振农
主编:	觉 醒	赖永海			
编委:	王邦维	方广钊	王雷泉	业露华	圣 凯
	宋立道	严耀中	陈 兵	张风雷	觉 醒
	姚卫群	洪修平	徐小跃	徐东来	麻天祥
	曹曙红	黄夏年	赖永海	慧 觉	潘桂明
	魏道儒				

总 序

佛教的修行以戒、定、慧三学为核心,以教、理、行、证为修学次第。但是,修行者的根机、兴趣等各有不同,于是对佛法各有偏好。从根本上说,义理与实修是无法分离的,这也是中国佛教的优良传统。所以,《高僧传》将古代僧人分为十科,其中翻译、解义、读诵属于义解门;而习禅、明律、感通、遗身、护法、兴福,则归属实践门;最后一科“杂科”则是指出家人的外学修养,傍及世间经书、治世学问、礼乐文章等,无不兼通。

但是,传统意义的佛教义解,主要是注疏经、律、论,在“述而不作”中表达自己的理解与观点。历史上的义解僧人们通常都是从自己的信仰与经验出发,通过注疏、撰著,来达到实践与弘法的目的。南北朝佛教的兴盛、隋唐佛教的辉煌,都与义解的繁荣分不开。而禅宗的发展则为中国佛教注入新的生命,强调主体的体认,注重身心的解脱;净土法门的流行,激发了佛教徒的信仰感情,为佛教走入社会提供了方便。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随着提倡“易行道”和“不立文字”的禅、净二宗的盛行,中国佛教徒逐渐失去探讨高深佛理、考察繁琐戒律的兴趣,于是,中国佛教重视义理研究的优良传统便丧失殆尽。

另一方面,佛学研究在佛教界之外却成为一门世界性



的学问。在“理性主义”、“科学主义”思想的影响下，世间学者开始注重对佛教思想的学术研究，并逐渐形成一种学术传统，于是佛教便成为一种学问——佛学。近代佛教学术研究的发展由于受到欧美治学风气的影响，文献学、考据学、思想史、语言学、社会学、人类学等方法被大量地使用，对佛教进行理性地分析，促使了人们对佛教认识更加深入。学术研究作为一种工具，用来剖析佛教的历史传承与思想意蕴，更凸显了佛教悠久的历史文化积淀。

因此，佛教学术研究的重要意义，不仅是了解存在于一定时空中的佛教发展形态，而且更是从现存的文献、文物中，去伪存真，探索其前后的历史延续和彼此的因果关联，从而更清楚地认识到佛法的本质及其历史发展，这对于人们的修习信行都是颇有助益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经培养了一大批以佛教为研究方向的博士，他们为我国佛教学术的繁荣做出巨大的贡献。对于一位研究者来说，攻读博士学位阶段大多正是精力最充沛、思想最活跃时期，而作为此一黄金时期学术思想结晶的博士论文，经常都有一些颇为耀眼的思想火花和超越前人的创新之处，因此，博士论文的出版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玉佛寺最近几年一直致力于佛教文化的弘扬，组织、编辑了《觉群》、《觉群佛学》、《觉群丛书》、《觉群佛学译丛》等书刊，为繁荣佛教文化作出了自己的贡献。《觉群佛学博士文库》的推出，更为我国的佛学研究开拓了一个新的园地。

这次《文库》的出版，还得到南京大学等相关高校及研

究机构的支持,许多青年才俊也奉献了自己的青春智慧,加入文库,值此《文库》付梓之际,编委会对所有曾为《文库》的组织、编撰和出版工作付出辛勤劳动和重要贡献的各界人士表示最诚挚的感谢,并衷心希望学界、教界乃至社会各界的一切有识之士今后给《文库》予更多的关注与扶持;愿见者、闻者,心生欢喜,让佛教文化更发扬光大。

《觉群佛学博士文库》编委会

2007年5月1日

序

对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前人给予较多的关注,研究成果也比较多,但这不等于这一研究领域已没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事实上,由于这一时期是域外佛学思潮全面涌入,并与中国传统文化发生剧烈碰撞、融汇的原初阶段,许多问题尚待进一步梳理。即便那些前人已经涉足、研究过的课题和史料,如果能从另一个视角,采取不同的方法,缘于“横看成岭侧成峰”之故,也许还可以有新的发现,从这个意义上说,此一时期的形神关系、儒佛交融、佛性理论和大乘般若学的流变等等,都有不断进行探讨和研究的必要。

般若学与佛性论是先后传入中土的两个大乘佛学思潮。而前者的流变及其向后者的过渡,构成了魏晋南北朝佛学思想发展的一条主线。造成这一发展进程的,远不止限于佛学内部的因素,它还纠杂着中国与印度(包括西域)宗教文化的诸多差异与碰撞。所以理清般若学向佛性论转变的轨迹,应是中国佛学史与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课题。由于以往对于魏晋南北朝佛学的研究大都采用断代史的写作方法,运用的是人物思潮的分解评述,或者是一般范畴的基本陈述,就很难看出这两种思潮交相更替的历史面貌。而府建明同志的这本《“性空”至“妙有”——



魏晋般若学的流变与转向》，以代表性人物及代表性思潮为“切入点”，采用历史呈现与逻辑梳理相结合的方法，把般若学的宗教性倾向与义学性倾向的消长，作为全书的主线，勾勒了般若学流变与转向的历史轨迹，这为这个时期的思想史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读后多有发人思考、给人启迪之处。

府建明同志自 20 世纪 80 年代起就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研习与编辑，20 多年的编稿、研究实践，使他积累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打下了颇为扎实的国学功底。博士论文选题时，他表示想将 20 多年来对魏晋南北朝佛学的思考，作一次系统的梳理，特别是侧重于从哲学层面去探讨和阐释魏晋般若学的流变与转向问题，我颇表赞同。现在这部著作是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的。书即将付梓，我非常乐意向读者推荐这部书，是为序。

赖永海

辛卯年夏于南京大学

自序

本书在作为博士论文递交时,原名为《魏晋般若学的流变与转向》。现公开出版,考虑到读者尚简的习惯,改为《“性空”至“妙有”》,而原名就移作副书名。全书的内容和形式基本保持原貌,仅对个别地方做了修改和补充,同时增加了一些注释。这并不是说此文已是完美无缺。事实上,从答辩通过到现在,已有整整一年的时间,我一直想对全文再做好好的梳理,并补写某些自感较为薄弱的部分。但苦于冗务在身,抽不出整块的时间,于是干脆以原貌示人,来一个“本地风光”,祈来日再好好修订吧。

我在攻读博士学位前,一直有想写一本《中国般若学史》的愿望,这部分源于个人的兴趣,部分源于我对中国佛学研究现状的思考。但论文写作时,我并没有完全按原初的想法展开。时间紧迫固然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而最主要的是考虑到博士论文写作的特殊性。在我看来,“创新”应是博士论文的第一原则,提出“问题”与解决“问题”是其根本任务,这就注定了它在谋篇与写法上都会与常规性学术著作有所不同。后者为了兼顾不同层次的读者,知识性铺陈往往是必须的;而博士论文为了凸现问题,有时恰恰要剥离这方面的内容。因此,我在写作本论文时,尽管原初的想法时有“作祟”,但最后成文时还是无情地删削了



很多,也注定了它已经不是一部全面完整的般若学史了。缘于同样的原故,细心的读者会发现,本论文各章的节目名称,也没有刻意谋求风格上的一致,而是各随所需而设。

此次正式出版时,我曾考虑是否回复原初的构想,即修改补写为一部《中国般若学史》。但考虑这将在体例、结构以及呈现方式上都将做全面的改动,因此最终放弃了这个念头。这也并不是我敝帚自珍。在我看来,关键性问题解决了,完整而系统的《中国般若学史》的问世只是时间问题。即便我本人无力承担,也会有人来承担。

关于论文开题和写作的详细情况,以及各位师友给予的种种帮助,我在“绪论”和“后记”中都已言明,此不赘述。而论文以成书的形式公开出版,必须得感谢业师赖永海教授和师兄圣凯博士。赖师多次鼓励我出版此论文,并在百忙中赐序。圣凯师兄则多次催促我交稿,没有他的热忱,这篇论文可能还在我的书柜里搁上些年头。还有,宗教文化出版社的王志宏编辑,为本书的出版费力甚巨,也让我十分感激。我自己虽然从事较长时间的编辑,但也程度不同地患上“编辑恐惧症”,唯恐别人的每一个改动影响到我的原意。但志宏的职业素养,让我这种顾虑完全消除。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家人和亲友,他们在我整个论文的写作过程中,给予种种理解,没有他们的支持,我也很难想象这篇论文能够如期完成和出版。

府建明

2011年7月26日

绪 论

一、本论文的选题意义和内容

般若学是传入中国汉地最早的佛教大乘思潮之一,它作为一种独立的佛学形态,在汉地的传布和流变达二百五十余年(以《道行般若经》之译出至晋宋之际涅槃佛性说的崛起为限)。这一思潮在东晋南北朝一时成为显学,其影响所及,除了中国佛学本身之外,还广布于中国哲学史、思想史、文化史之中。而后秦弘始三年(公元401年)至南朝宋元嘉七年(公元430年),亦即鸠摩罗什入关至竺道生倡“阐提成佛”说这大约三十年的时间,更是中国佛教思想史上波谲云诡的时期。一方面,随着罗什入关弘传龙树中观学,使本已成为显学的般若学更为流行,不仅将其时玄学推到了一个新高度,而且开启了中国佛学独立自存的局面,这深刻影响了其时中国的文化和思想风尚;另一方面,随着涅槃佛性说的流传和增长,特别是竺道生“孤明先发”力倡“阐提成佛”说,佛性论代般若学而起,成为了中国佛学的主流,并直接影响和确定了其后中国佛学的基本路向。缘此,厘清般若学在中国的流变和转向,以及它与教内思潮及中国固有思想文化的关系,对正确理解中国佛教之特质、中国佛教各宗派之思想以及中国哲学之丰富性和多样性,皆有重要的意义。



从直观的印象出发,作为唱“性空”之旨的般若学,被异军突起的唱“妙有”佛性说的涅槃学所取代,无疑是中国佛学史上的一大转变,它不仅标志着佛学理论品格的转变,也标志着信仰心理、信仰形式的转变。但长期以来,学术界基于不同角度,往往将这两种佛学形态作为个案加以研究,较少提到两者此消彼长的诸多动因。这就给人这样的印象:般若学与佛性论的消长,似乎是一个偶发因素,它们主要基于各自经论的译传与弘扬,或者缘于个别僧人的重视与独创。但深入探究,我们发现,般若学与佛性论的交互与消长,固然有偶发的因素,但它们的转变无疑有着更为深刻的理论动因和历史根源。就理论动因而言,发生在先的龙树中观学,在内容、观点乃至思维方法上,皆有着统一性和多样性的特征,而多样性(亦可称之为杂多性或矛盾性)恰恰成为般若“性空”义向佛性“妙有”义转变的理论内驱力,这股内驱力经由罗什汉籍弟子们(以僧叡、僧肇、道生等为代表)的重塑与改造,使得罗什所传的相对纯粹的龙树中观学,发生了质的变化。就历史根源面言,不独有佛教内部的因素,而且有佛教外部的因素;不独有宗教的因素,而且有文化的和哲学的因素。般若学正是在这多重因素的影响下,结合其理论内驱力,实现了向佛性论的全面转变。

本论文正是基于如上思考,通过对般若学的两重特质(宗教性与义学性),以及三重向度(文化的、哲学的、宗教的)的考察,着重梳理魏晋时期作为“显学”的般若学之流变,特别是中观学向佛性论之转向的脉络,分析这种流变与转向的理论动因、历史成因,以此较为系统和正确地反映佛教的中国化历程。

需要说明的是,本论文下限所涉之道生创“阐提成佛”说,从时间上讲已在南朝宋,但由于其时的思想风气基本承绪东晋,且涅槃佛性论的发动也是在晋末,故本论文仍将其与般若学的关涉内容,置于魏晋般若学发展的大框架内。此正如汤用彤先生所言:“盖政治制度之变迁,与学术思想之发展,虽有形影声响之关系,但断代为史,记朝代之兴废,固可明政治史之段落,而于宗教分划,不必即

能契合。”^①其于同样的原因,在分析早期般若学史和后来的“形神之辩”时,也有适当的上下拓展,以使脉络更加清晰,而所述问题能得以较全面的解决。

本论文由导言和正文五章组成:

“导 言 般若经与般若学渊源”,简要介绍和分析域外般若学的原生形态、历史发展和思想特质,为正文的展开做准备。

“第一章 初传与生长”,结合早期般若学流行的时代背景,考察早期般若经译传的情况和特点,着重分析早期般若学“依附”玄学的发展形态,以及与中国本土思想文化的交互关系。

“第二章 弘传与勃兴”,以罗什译传般若类经与中观诸论为中心,着重考察中观学盛行的历史成因和理论动因,剖析中观学理论的一致性与矛盾性,以及它作为宗教哲学时暴露出的义学与信仰的冲突。

“第三章 正传与融会”,以罗什弟子中的僧叡、僧肇为代表,以他们思想中的“统一性”与“杂多性”为切入点,考察中观学“正传”与“融会”这两种主要质态,以及这两种质态展开过程中的矛盾及其演进。

“第四章 异说与竞起”,以觉贤与慧远为代表,以小乘有部与中土神不灭论为内外思潮竞起的典型,考察中观学与这两类思潮的理论差异,以及它们之间碰撞与交锋的历史情况,展示中国佛学的复杂性及般若学转向的不可避免性。

“第五章 回归与转向”,以《法华经》与《大般涅槃经》的盛传为背景,以罗什弟子(特别是竺道生)的全面转向为基本事实,分析“佛性”说代“性空”与“实相”说而起的经典依据与信仰动因,阐明般若学作为一种主流佛学思潮最终衰微的结果。

^① 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稿》“绪言”第1页,中华书局,1981。

二、本课题的研究现状及特点

般若学既然是中国早期最主要的佛学思潮,当然历来是中国佛教史、哲学史及思想史研究的重点。

就佛教史著作而言,有关中国般若学的研究成果主要有三类:一类是通史或通论中的研究,一类是相关专史或专论性的研究,还有一类属于散论。具体情况如下:

(1)通史或通论中的研究。在我国,以汤用彤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吕澂的《中国佛学源流略讲》、任继愈主编的《中国佛教史》、郭朋的《中国佛教思想史》、潘桂明的《中国佛教思想史稿》等为代表,这些著作都设有专门篇幅阐述般若学的历史和思想。以时序划分,汤著和吕著代表了早期研究的成果,其中汤著对中国早期般若学史实和代表人物事迹的考辨尤为详尽,吕著则对般若思想与中国文化的同异性分析尤见功力,这两部著作的不少观点现为学术界所公认。任著代表了中期研究的成果,也是以马克思主义方法研究佛教史的代表之作,而有关般若学的研究,内容较汤、吕二著为丰富,特别是对汉译般若经论的思想与特色,以及中国般若学生长的历史根源等分析,超过了以前的著作。潘著代表了近十余年来的新成果,侧重对具体人物思想的述论,而有关般若学中国化过程的分析较为突出。国外的中国佛教通史类著作中,也多有对中国般若学的分析,如镰田茂雄的《中国佛教通史》等,但总体不超出汤、吕二著的观点。至于一些中国哲学史和思想史的著作,虽然都有阐述般若学的章节,但大都内容十分简略。

(2)相关专史或专论性的研究。这一类别的研究中,大致以般若学为研究对象的著作,近现代的主要有道安的《空的哲理》、牟宗三的《佛性与般若》、印顺的《空之探究》等,当代的主要有姚卫群的《佛教般若思想发展渊源》、华方田的《中国佛教与般若中观学》、杨俊诚的《般若与玄学》、沈行如的《般若与业力》、蔡宏的《般若与老庄》、罗因的《“空”“有”与“有”“无”——玄学与般若学交会问题之

研究》、李勇的《三论宗佛学思想研究》、董群的《中国三论宗通史》、涂艳秋的《鸠摩罗什般若思想在中国》、释严莲的《龙树中观思想在华流播研究》(博士论文)等。其中近现代的几部著作,都是一般性的义理陈述和比较分析,而且篇幅较小。而当代的几部著作,有的主体放在印度般若学上(如姚著和华著),有的主体放在三论宗上(如李著和董著),有的重点放在般若学与玄学之比较上(如杨著、沈著、蔡著、罗著),有的则把般若思潮做了泛化的过程性描述(如涂著和严著)。这些著作中,学术质量较高的是姚著和董著,但其观点总体不出汤、吕、任等著。国外对般若学的研究的著作数量甚丰,重要的有山口益的《般若思想史》、《中观佛教论考》,安井广济的《中观思想研究》、宫本正尊的《中道思想及其发达》等,但这些著作也都是以印度般若学为主体,涉及的中国般若学内容十分单薄。所以,确切地说,真正把魏晋般若学这一“显学”思潮作为一个专题来研究的著作,目前尚是阙如。而国外对中国般若学的研究,总体水平和成果,还不及国内。

不过,涉及般若学人物、著作及思想的个案研究著作,数量十分丰富。其中,由于僧肇是中国般若学史上的代表性人物,故有关僧肇及《肇论》的研究著作最为突出,如:刘贵杰的《僧肇思想研究——魏晋玄学与佛教思想之交涉》、李润生的《僧肇》、洪修平的《论僧肇哲学》、涂艳秋的《僧肇思想探究》、许抗生的《僧肇评传》、孙炳哲的《〈肇论〉通解及研究》、曹树明的《〈肇论〉思想意旨及其演变》等等。另外,这些著作在进行微观研究时,也都涉及般若学宏观发展的内容,不过总体上都十分简约。

(3)散论。这一类别的研究,多以单篇论文的形式出现,散见于各种学术刊物、个人论集及其他著作中,数量异常丰富。近现代一些佛学名家,如欧阳渐、太虚、法尊、唐君毅、黄忏华等,均有相关的论文,现结集于《般若思想研究》(张曼涛主编《现代佛教学术丛刊》第45册)中。而陈寅恪、汤用彤和吕澂等的相关研究,具见于他们各自的相关著作和文集中。上世纪80年代以后,有关这方面